

及“新村”规约的制定与修订、“新村”领导人的选任与改任、其他与“新村”有关的村民福祉等。通过村民大会，村民既可以分享意见，加强沟通交流，也可以培养、提高村民们“参政议政”的素养，使村民们尽早地向“民主化村民”转变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2000年以后，韩国提出“建设共同生活的共同体”的新蓝图，大力推进“第二次新村运动”，将其作为“韩国创造”品牌推向全世界。2003年起，菲律宾、刚果（金）、蒙古、中国、越南、阿富汗、乌干达、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派团前往韩国学习借鉴。2009年开始，韩国发起开发援助工作，向发展中国家农村传授经济发展经验，行政安全部从2009年到2019年面向70个国家约3500人实施“新村领导人”培训，支持19个国家60个示范村建设。2013年“新村运动”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“世界记忆遗产名录”。2014年起，“地球村新村”领导大会召开，2016年世界“新村运动”组织网络“新村运动全球联盟”（SGL）正式成立。“新村运动”开启了国际化路线。2018年，韩国将社会共同体运动、经济共同体运动、文化共同体运动、环境共同体运动、地球村共同体运动作为重点领域推进。通过这些活动，将聚焦家庭新村运动、地区社会新村运动、地球村新村运动领域展开活动，目标是创



上图：韩国庆尚北道举行“新村运动”国际论坛，潘基文积极推动“新村运动”国际化。

造夯实国家发展的基础、提高共同体意识，为实现地球村共同繁荣提供韩国样板和力量。

略显式微的根由

从实践看，韩国“新村运动”成就斐然，但仍难掩一些“瑕疵”。运动开展的一半时间里，都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运动，形式上具有指令性和非民主的性质，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行政手段，无形中助长了一些人的依赖性和被动性，而且统筹安排一些内容没有“因地制宜”。受韩国人“急躁的民族性”使然，过分强调实践为主，理论研究滞后，导致很多方面没有前瞻性，整个运动缺乏系统的相关理论基础，导致许多建设项目和发展方向没有前瞻性，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，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“新村运动”无论内

容还是形式都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，因此没有保持可持续长久的旺盛的生命力。

《时事周刊》指出，更让人诟病的是，随着政权交替，“新村运动”甚至一度沦为政权腐败工具。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，曾任总统警卫室长的全京焕（继任总统全斗焕的弟弟）揽过“新村运动”的实际指挥权，他通过政治手腕当上运动中央本部事务总长。1985—1987年，他又先后担任“新村运动”协会中央本部会长、中央协会中央本部名誉会长兼名誉总裁等职务，七年间彻底将“新村运动”变成自己为所欲为、中饱私囊的大舞台。这一过程中，全斗焕总统成为弟弟的“忠实后盾”。

前总统朴正熙曾在新村运动中建立严密的地方组织体系，向全国宣传政策方向，但也为自己巩固了农村的“铁票仓”。而全京焕不仅利用这些网络谋取自己的利益，而且还借用这些网络发挥政治影响力。全京焕专横最为明显的事件就是“牛肉价格波动”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进口小牛并进行繁育销售被认为是韩国最红火的生意，全京焕以“给新村领导人提供小牛转让优惠”为由，向农林水产部施加压力，结果是原定为5万头的小牛进口计划增至7.4万头，结果市场供过于求，曾经高位运行的牛价出现暴跌，而且进口的牛群中还出现了传染病，让农民亏了血本。最后，当总统的哥哥也护不住小弟了，全京焕受到检察机关调查，发现其贪污了约73亿韩元。1988年，全京焕以逃税、权钱交易等7项罪名被起诉，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罚款22亿韩元，追加罚款9亿韩元。（注：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，将南朝鲜改称为韩国，本文为了表述方便，统称韩国。）
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“新村运动”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，因此没有保持可持续长久的旺盛的生命力。